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戰略文化：戰略研究的文化途徑

A Cultural Approach to Strategic Studies

doi:10.30390/ISC.199606_35(6).0003

問題與研究, 35(6), 1996

Issues & Studies, 35(6), 1996

作者/Author：莫大華(Ta-Hua Moh)

頁數/Page：39-5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6/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06_35\(6\).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06_35(6).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戰略文化：戰略研究的文化途徑

莫大華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了解戰爭決策者的戰略行為，也就是決定與執行國家戰略的決策者的思維模式，有助理解本國與他國的戰略。國家戰略決策者與執行者所組成的社群，即是戰略社群，他們的行為有其共同規則，藉以維持社群的一致性而逐漸形成該社群的文化型態。戰略社群所形成的社群文化，可名之為戰略文化。對於戰略研究，可對從事戰略決策與執行的社群成員，所形成的戰略文化進行了解，以掌握其戰略與軍事思維及行為，特別是國家加諸於軍事體制上的軍事準則。

關鍵詞：戰略文化、戰略研究、戰略社群、軍事準則

* * *

壹、前言

戰略研究是國際衝突研究最先發展的研究途徑，其目的在於了解國家發生戰爭或衝突的原因，以及贏得戰爭的方法。^①因此有必要了解戰爭決策者的戰略行為，也就是決定與執行國家戰略的決策者的思維模式。國家戰略決策者與執行者所組成的社群，即是戰略社群 (strategic community)，它是人的群體組合，它並不意味著這群人會特定的聚合在一起決定與執行國防戰略；它存有許多體制 (establishment) 進行決定與執行國防戰略的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軍事體制，其他還有安全體制、政治體制等。戰略社群是由人群所組成，但人群並不是生物性的個體 (individuals) 而是文化性個人 (persons)，他們的行為有共同規則，以維持社群的一致性 (unity) 而逐漸形成該社群的文化型態。社群文化是組織內的個人及團體間互動關係的模式，在互動之中所提供的規則性與可測性為其建立基礎，因此社群是指表現文化行為的人群，其文化行為具有規則性與可測性。因此，戰略社群所形成的社群文化，可名之為戰略文化 (strategic culture)，^②戰略文化因而具有界定戰略社群及軍事體制角色

註① 林碧焯，「國際衝突的研究途徑與處理方法」，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三期，民國八十五年三月，頁二。

註② Gerald Segal 則是以「國防文化」(defence culture) 稱之，它指涉的是菁英對國防政策基本組成與持續成份的認知，Gerald Segal, Defence Culture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8, No. 2 (June 1985), pp. 180~198。

、認同、控制等功能。

因而對於戰略研究，可對從事戰略決策與執行的社群成員所形成的戰略文化進行了解，以掌握其戰略與軍事思維及行爲，特別是國家以軍事體制的軍事力量作為追求國家利益的工具時，軍事體制都必須順從國家加諸於其體制上的準則，也就是軍事準則（military doctrine）^③，並盡力去達成國家政策目標，然而若是如此，則何以許多國家的軍事體制的規模與結構，超出其國家安全需要的範圍？各國的戰略與軍事準則又怎會有所不同？軍事體制達成政策目標的效能又何以呈現差異？這都是不同國家的戰略行爲間的差異。

本文主旨在結合戰略文化與軍事準則的概念，說明其在呈現解答上述問題中的創造性與啟示性，並為戰略研究提供新的角度與視野。

貳、戰略文化的研究

戰略的形成與執行，不能單從國家政策（national policy）的角度予以研究，有必要對於國家主觀體認而非理性客觀衡量的文化予以探討，甚至戰略的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因為戰略的決策者在其規劃與決定戰略時，有其主觀與相對判斷的指導原則，即使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也是普魯士文化的產物，然而國際戰略研究卻出現了「美國中心主義色彩」（American ethnocentrism），忽略戰略的各國差異（national styles of strategy），^④甚至戰略研究有美國霸權權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的現象，^⑤因此戰略學者創造出「戰略文化」概念，並藉此呼籲對戰略之文化作嘗試性的研究，也使近年的戰略研究，產生了「戰略文化」的研究途徑，企圖找出各國的「戰略原則」（principles of grand strategy）與「戰爭之道」（way of war），以分析該國戰略與戰爭行爲。至於這些「戰略原則」與「戰爭之道」是否能運用於其他國家，這又是另一國家戰略文化調適的問題。葛瑞（Colin S. Gray）就說：「戰略文化啟發一個國家研究其國防問題與機會的途徑（approach），它的成果是該國在國防備戰與戰爭行爲上的國家特質。」^⑥

「戰略文化」是史奈德（Jack L. Snyder）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蘇聯的戰略文化（*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一書中，最先使用此語預測蘇聯的政軍領導人接受有限核子戰爭的可能性，^⑦史奈德界定

註③ 必須先提醒，此處「軍事準則」之譯文不是一般所指涉的教範、操典之意涵。

註④ Joseph S. Nye, Jr. and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n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2, (Spring 1988), pp. 14~15.

註⑤ Bradley S. Klein,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ce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4, No. 2 (April 1988), pp. 133~148.

註⑥ Colin S. Gray, *War, Peace, and Victory: Strategy and Statecraft for Next Century* (New York: Touchstone, 1991), p. 46.

註⑦ Jack L. Snyder,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6).

「戰略文化」為國家的戰略社群成員對於核武戰略指令或模擬，所共享的整體概念、制約性的情感反應以及習慣行爲的模式等的總合。⑧史奈德並無意以此概念發展成理論，克蘭（Yitzhak Klein）則嘗試建構「戰略文化」理論，就其觀點，「戰略文化」是軍事體制內對於戰爭的政治目標及達成該目標最有效戰略與執行方法所持有的態度及信念。⑨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則整合學者對「戰略文化」之研究，定義「戰略文化」是個整合的符號系統，用以陳述軍事力量在國家間的政治事務上的角色與效率，及藉由獨特的實際性與效率性的戰略偏好的事實表現這些概念而建立普遍又持久的戰略偏好。⑩布斯（Ken Booth）更創造「美國戰略人」（American Strategic Man）的概念說明美國人的戰略觀；⑪標德（Carl H. Builder）則以軍種性格（service personalities）理解美國的軍事戰略，⑫使戰略文化概念的運用又更進一步。戰略文化的研究學者相信，信仰、價值與傳統會影響各國進行戰爭的原因與方式，各國有其獨特的「文化」影響該國的戰略，學者就是要發掘出這些獨特明顯的差異。⑬

綜合上述學者定義，可歸納出戰略文化是國家戰略社群成員對於軍事體制運用在政治目標的達成上，所共享的習慣行爲模式與價值符號體系。國家戰略社群成員意指那些界定戰爭的政治目標與達成此目標的方法之人，特別是專業的軍事體制成員（並不排除其他文人政治菁英或戰略學者），他們藉由價值符號體系整合個體。戰略文化並不是永恆不變，它是會成長與變遷的，它會有縱的歷史傳統繼承，也會有橫的空間擴散布。如果它部分是一個國家的軍事經驗的產物，則戰鬥會是它最偉大的教導者（educator），國家擁有經常戰鬥的經驗，就較能選擇合於該國戰略的軍事準則及執行戰略的方法。⑭也就是選擇其適合的戰爭觀與戰爭之道，因此所謂「美國的戰爭之道」（The American Way of War）、⑮「中國的戰爭之道」（Chinese Ways in Warfare）的詞語也就出現了。⑯

註⑧ *Ibid.*, p. 9.

註⑨ Yitzhak Klein, "A Theory of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No. 1 (1991), p. 5.

註⑩ Alastair Iain Johns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 46.

註⑪ Ken Booth, "American Strategy: The Myths Revisited," in Ken Booth & Moorhead Wright, eds., *American Thinking About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Inc., 1978), pp. 1~35.

註⑫ Carl H. Builder, *The Masks of War: American Military Styles in Strategy and Analy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註⑬ Alan MacMillan,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Ways in Warfare: The British Case," *RUSI Journal*, Vol. 140, No. 5 (Oct. 1995), p. 33.

註⑭ Yitzhak Klein, *op. cit.*, p. 13.

註⑮ Russell F. Weigley,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註⑯ Frank A. Kierman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叁、決定戰略文化的因素

戰略文化的形成與成長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各因素的影響程度則會因各國而有所不同，基本上影響戰略文化的因素可有：^①

一、地緣政治位置 (geopolitical setting)

島嶼國家的戰略偏好、取向、軍事體制結構勢必不同於大陸國家，領土的位置、地勢、國境、海岸線等地緣政治位置因素，都會影響其戰略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如中國國土廣大，陸地國境長，東面大洋受海上攻擊較不易，自須保有強大陸軍守衛國境；美國東西俱濱大洋，南北鄰國軍力衰弱不足為懼，加諸資源豐富可自給自足，平時只須保有強大海軍即可保障國境安全；德國位於歐洲心臟區域，有多面應敵的情勢，故其除以陸軍為主外，更重視其動員力與機動力。葛瑞就認為地緣因素是國家戰略文化的主要因素 (major contributor)。^②

二、國際關係與國際法

軍備是有形的國防，外交是無形的國防，國防戰略可藉由外交結盟或協商使國家在國際環境處於有利地位，無論是盟國或敵國都會影響國家的戰略文化，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在亞洲少有與之抗衡的敵國，自然與蘇聯面臨法德敵國而有所不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國際關係上的強勢，就影響其原有的戰略文化。一般而言，多敵國之國多傾向利用國際關係結盟抵抗敵國，也多以防禦為國防戰略；大國則多以擴展國力而少以外交結盟對抗主要敵國，其攻擊式的國防戰略也較重，因此國際關係對於戰略社群成員的戰略偏好與決策自有某種程度之影響。此外，因為國家身為國際社會的成員，對於國際社會的規範（如國際法）有義務遵守，因而國際法對於國家的戰略行為也會產生影響，^③當然，戰略文化也會影響國家對國際法的遵守。

三、政治文化或意識形態

戰爭是在達成政策目標，其本身就是個政治議題，當受國家的政治文化的影響，甚至軍事體制在國家的社會與政治上的角色，都會受到政治文化的影響。民主國家對於戰略的形成多要求參與及公開等程序，軍事體制遵從民主憲政的規範，軍事體制並

註① Carnes Lord,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5, No. 3, pp. 272~274; Stephen Peter Rosen, "Military Effectiveness: Why Societ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17~31.

註② Colin S. Gray, "Geography and Grand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No. 4 (1991), pp. 311~329.

註③ Stephen A. Kocs, "Explaining the Strategic Behavior of States: International Laws as System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8, No. 4 (Dec. 1994), pp. 535~556.

不獨專戰略知識，有許多文人的戰略專家或制度參與戰略並成為戰略社群的成員，強調文人統治至上（civilian control supremacy），軍事體制要受民意機關的節制，以不太可能「槍桿子出政權」，也不能主動發動對外戰爭以求取個人生涯發展。更重要的是民主國家多傾向於妥善備戰或培育能戰的制度或人才，^②然而戰爭爆發時，軍事戰略目標卻常受到民意機關的制掣而未能獲致勝利，如美國在越戰的經驗。

有時流行的意識形態也會影響戰略文化的思考，如各強權國家（德、英、法）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因為當時「防禦軍事戰略」的意識形態盛行而使大戰爆發。^③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集團對抗、美國出兵海地（Haiti）協助其民選總統復位，某種程度也是受「民主意識形態」的影響。

四、軍事文化（歷史、傳統與教育）

國家的軍事歷史或經驗於戰略文化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每次的戰爭或戰役，都是檢視現有國防戰略與軍事準則的試金石。在冷戰時期的一九五〇年代，美國採取「大舉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戰略，以核武嚇阻蘇聯對美國的歐洲盟邦進行攻擊，以抵消蘇聯在傳統武力的優勢；一九六〇年代，由於蘇聯也擁有核武，使美國戰略改為「彈性反應」（flexible response）而不再僅靠核武，要尋求與歐洲盟邦共同建立強大的傳統武力，以對蘇聯的侵略作出彈性反應，自此美國戰略原則是防衛（不發動戰爭）、嚇阻（核武與傳統武力威脅）及恢復和平（侷限戰爭範圍）。^④直至九〇年代發起一九八九年入侵巴拿馬（正義行動）、一九九一年波灣戰爭（沙漠風暴行動）、一九九二年出兵索馬利亞（重建希望行動）、一九九五年出兵波士尼亞則不是針對蘇聯，而是因美國強加秩序於國際體系上而發動。而且，即使在行動之後，美國通常都嘗試在國際法下使其行動正當化，^⑤尤其是索馬利亞與波士尼亞的維持和平行動，使學者對美國的戰略文化產生不同的爭議。^⑥

甚至軍事文化是以戰鬥及雄糾糾的戰士模範（paradigm）為特質，^⑦軍事教育是在傳承軍事文化的特質，而軍事儀禮也是在鞏固軍事文化傳統，^⑧軍事文化使軍事體制成員結成一體，並與國防工業及國會結合成利益團體的「軍工複合體」（military-

註②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id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19~58.

註③ 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註④ 彭恆忠譯，美國國防報告書（上册）（台北市：三軍大學，民七十四年），頁二五~三三。

註⑤ Lawrence J. Korb, "The United States," in Douglas J. Murray and Paul R. Viotti, eds., *The Defense Policies of N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3~54.

註⑥ Martin P. Adams, "Peace Enforcement Versus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Strategic Review*, Vol. 23, No. 1, (Winter 1995), pp. 14~22.

註⑦ Karen O. Dunivin, "Military Culture: Change and Continuity,"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 20, No. 2 (Summer 1994), pp. 533~34.

註⑧ Morris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id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6), pp. 196~214.

- industrial complex) 而影響國家國防戰略，改變國家的戰略文化。

五、文武關係與官僚組織

波莫特 (Amos Perlmutter) 主張現代民族—國家有三種類型的軍事體制以作為制度化的文人權威反應：專業軍、禁衛軍 (the praetorian) 與革命軍。^②文人與軍人的相對權力與控制關係，無論是主觀或客觀的控制，^③軍事體制在文武關係間的政治力量，必然在國家戰略規劃與執行上起一定的作用。強勢的軍事體制，如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日本軍事體制，對國家戰略就擁有主導的力量，因而採取侵略發展的戰略。軍事體制是可以影響與參與政治，但絕不能控制政治，否則軍事體制即喪失其政策工具的角色，極易使國家戰略文化產生軍國主義的黷武思想而輕易發動攻擊性的戰爭。

六、武器與軍事科技

科技化的裝備與武器改變了國家戰略與軍事準則，特別是戰略核子武器的出現，加上多目標彈頭載具的發展，使得核武「相互保證摧毀」(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戰略在人類「恐怖平衡」的心態下，進行有限的戰爭或衝突。偵察衛星的发展革新了情報的蒐集技術，使美蘇限武協定查證得以精確，也使限武戰略得以進行。精密導引的傳統和低能量戰術核子武器，更使美國的「彈性反應」戰略可以遂行。在後冷戰時期也由於現代科技之賜，增加了軍隊的機動性與火力，使各國紛紛成立快速打擊部隊，以應付「低度衝突的軍事作戰」，^④美國也就產生進行「兩個主要的區域衝突」(two major regional conflicts) 戰爭的戰略。新武器科技發展涉及軍事能力 (military capability) 的發展及改變戰略思維與戰爭的執行，^⑤進而影響戰略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七、社會結構

軍事體制與國家戰略社群是社會的一部分，現代 (工業) 社會與傳統 (農業) 社會不同的社會結構所發展的戰略文化也有所不同，現代工業社會由於資本累積與發展的需要，多具攻擊性的戰略文化；傳統農業社會若無天災人禍常固守耕地，多是防禦性的戰略文化。宗教性強的社會亦會發展出不同一般的戰略文化，如伊斯蘭教 (Muslim) 國家將伊斯蘭教義的發展納入其戰略與軍事準則而較具暴力 (violence)，基督 (天主) 教 (Christianity) 國家則較無暴力的傳統。^⑥拉丁美洲更由於其社會結

註② Amos Perlmut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 On Professional, Praetorians, and Revolutionary Solid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9~17.

註③ Samuel P. Huntington, *op. cit.*, pp. 80~85.

註④ 高其清譯，低度衝突之軍事作戰 (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民國八十三年)。

註⑤ Wayne K. Maynard, "The New American Way of War," *Military Review*, Vol. 73, No. 11 (November 1993), pp. 11~12.

註⑥ James L. Payne, *Why Nations Arm*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9), pp. 121~146.

構的歧異，使其軍人干政成爲普遍現象，^②影響其所發展的戰略文化。

八、戰略思想的傳統

這是影響戰略文化的主要因素，從傳統的戰略思想著作所形成的戰略思想傳統特質或是相同的思想趨勢，對於當前戰略社群成員的行爲會產生影響，美國陸軍就曾摘錄英國陸軍少將富勒（J. F. C. Fuller）的著作而成爲美國陸軍的作戰原則。^③曾胡治兵語錄與孫子等著作，就成爲國軍軍官必讀之經典。學者林中斌就認爲中共的核武戰略與準則受到中國傳統戰略思想（著作）的影響，其戰略原則的演變可從中國的戰略傳統發現。^④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也認爲中國傳統的戰略思想對中共人民解放軍、嚇阻戰略、軍事力量的目的有著影響。^⑤魏格里（Russell F. Weigley）也認爲美國的傳統的戰爭方法就受到葛蘭將軍（Ulysses S. Grant）和薛曼將軍（William T. Sherman）、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杜黑（Giulio Douhet）及米契爾（Bill Mitchell）等人著作的影響。^⑥

同時，當代的戰略學者、研究機構與實務者的戰略研究，亦是在塑造戰略思想的傳統，也有一定的影響，^⑦如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喬治城大學的戰略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肯楠（George F. Kennan）等。

肆、戰略文化的類型

多數的戰略文化研究學者並未對戰略文化予以分類，只在敘述戰略文化的內涵與層級（levels），江憶恩是少數將戰略文化依人類事務衝突的頻率、暴力手段的功效及衝突本質三層級，以高低程度評級（ranking）而分爲強硬的實際政治（hard real politik）與柔軟的理想政治（soft idealpolitik）兩類型的戰略文化，兩者之間是連續體（contia）的關係，例如極端強硬的實際政治是戰略社群成員選擇最高度的攻擊戰略，因爲這最能處置零合（zero-sum）的衝突威脅；另一端則是柔軟的理想政治而戰略社群成員則偏好較調和、外交手段的戰略，因爲這最能運用交易（trade-offs）

註② Gino Germani and Kalman Silvert, "Politics, Social Structure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Wilson C. McWilliams, ed., *Garrisons and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in New States* (San Francisco: Chandler Publishing Co., 1967), pp. 227~248.

註③ 李植谷主編，*美國軍事戰略概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五五八~五六五。

註④ Lin Chong-pin, *China's Nuclear Weapons Strategy*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8).

註⑤ Jonathan D. Pollack,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trategic Thought," in Robert O'Neill and D. M. Horner, *New Direction in Strategic Thinking*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1), pp. 137~152.

註⑥ Russell F. Weigley, *op. cit.*, pp. 52~53, 223~241.

註⑦ Marc Trachtenberg, "Strategic Thought in America, 1952~1966,"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4, No. 2(1989), pp. 301~334.

、勸告來處理衝突。^⑧戰略文化就其對象（object）區分類型如下表：

戰略文化類型表

	戰爭本身為對象	敵國威脅為對象	軍事力量為對象
現實政治型	1	1	1
務實政治型	1	1	0
理想政治型	0	0	0

（1表示最高程度的態度；0表示最低程度的態度）

資料來源：本文

一、現實政治型

戰略社群成員對戰爭視為不可避免的人類社會現象，因為國與國的利益衝突是零合的，敵國的威脅也是無所不在，而且相當敏感於敵國的威脅視為迫切的危機，對威脅的處理則偏好直接式的回應，甚至採取跨越國境的回應方式，對軍事力量的運用視為處置威脅的主導手段，軍事體制的建設具相當的規模與力量，其軍事準則也是積極攻勢的心態與戰略。

二、務實政治型

戰略社群成員也視戰爭為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但國與國間的利益衝突卻是非零合（non-zero-sum）的，敵國威脅不是無所不在，甚至對威脅的回應可分別處置，軍事力量只是其中之一罷了。結盟與集體安全都是回應威脅並有助國家利益與安全的間接手段，回應威脅的手段，完全視本國的能力與利益而定，調和的與外交的手段都可以運用，其軍事準則並無明確的攻守勢的戰略。

三、理想政治型

戰略社群成員視戰爭為一時異常的現象，只要改善人類社會與國際環境成集體合作的社會，人類利益的調和是勝過利益衝突的，敵國威脅是不存在的，因為各國間是互賴互依的利益關係，軍事力量是不必要也是浪費的，即使非要不可，也僅是國內維持治安的警察力量，因此限武與裁武對現今國際是絕對必要的，外交談判與協商都可取代軍事力量，因此其也無所謂的軍事準則。

戰略文化的類型概念是在協助分析研究戰略，其間仍是連續體的關係，實際現實世界並無純粹的類型，也因此許多戰略文化學者無意由此去分析各國戰略而願意採務實的角度，從決定因素中萃取出各國的戰略文化，並觀察其持續與變遷。

伍、戰略文化的持續與變遷

註^⑧ Alastair Iain Johnson, *op. cit.*, pp. 46~49.

從歷史的角度觀之，每個國家的戰略文化都在塑造戰略社群成員的戰略決策行爲，反之，戰略社群成員也在影響戰略文化的持續與變遷。然而對戰略社群成員而言，當戰略文化充滿社群時，成員也就很難注意到戰略文化的存在，因為距離太近了，戰略文化已經變成第二天性，就不太會去想它。對戰略決策者而言，體認到國家的戰略文化，是其進行戰略決策時的首要任務，這其中尤要考量影響戰略文化的決定因素（地緣政治、國際關係、政治文化、軍事文化、文武關係與官僚體制、武器與軍事科技、社會結構），並進而瞭然戰略文化內涵的持續與變遷。每個決定因素的改變都可能促成戰略文化的變遷，變遷的過程是緩慢、漸進的演化，特別是軍事體制的軍事文化必須對於軍事力量，在平時的部署及政治上的運用，予以適當的研究，根據戰略文化的淵源、內涵、彈性、適應性、持續性與結構，擬訂出一套有關國家軍事力量運用的廣泛觀點，即是有效的軍事準則，並將之傳達給整個國家安全體系、立法機關及一般民眾，使之感應分配必要的資源建立所需的有效能的軍事體制，並動員國內廣泛的一致意見，支持軍事力量達成政策目標。戰略文化變遷之後，特別是在有所軍事創意（military innovation）之後，也就產生新的戰爭觀與戰爭之道，³⁹梅納德（Wayne K. Maynard）就認為「美國新的戰爭之道」（The New American Way of War）已經產生。⁴⁰

任何一場戰事都是檢驗戰略文化與軍事準則的成功與否的測度，只要戰事不起，戰略文化則始終居於主導戰略的地位，主觀的判斷與臆測亦成爲戰略決策的主要行爲，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擁有核武的強權國家基於「恐怖」的相互嚇阻戰略，更是少數戰略社群成員主觀的判斷與臆測，但人類社會絕不希望有檢驗的機會。軍事體制面臨這樣的情勢，不能因全面核戰未發生而確認此軍事戰略是健全有效的軍事準則。

陸、戰略文化與軍事準則

戰略文化如同文化可藉由社會化過程傳承至國家戰略社群成員，特別是戰略決策者，進而影響戰略決策者將戰略文化轉換成戰略的決策前提，主要是主觀價值前提而決定戰爭的政治戰略目標、戰術方法、訓練、裝備、軍力結構等。戰略文化既然是習慣行爲模式與價值符號體系，是由戰略社群成員所共享的態度，其態度取向包括對戰爭本身的態度、對敵國威脅的態度與對軍事力量運用的態度，其中特別是對軍事力量運用的態度，即使在冷戰時期結束後，仍是戰略分析者研究的主要目的，⁴¹也就必須對於戰略文化在此層面的影響予以探討，即分析戰略文化與軍事準則的關係。

然而，戰略文化是個主觀的、非理性的且是隱含未明的意涵，即使從其衍化而來

註³⁹ Stephen Peter Rosen, "New Way of War: Understanding Military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 (Summer 1988), pp. 134~168.

註⁴⁰ Wayne K. Maynard, *op. cit.*, pp. 5~17.

註⁴¹ John Chipman,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Studies: Beyond Even Grand Strategy," *Survival*, Vol. 34, No. 1, (Spring 1992), p. 129.

的戰略原則，仍有待客觀的、理性的及實際的軍事準則予以驗證。「國防戰略」它指引國家的安全目標、國家防禦戰爭的發生與進行；「軍事準則」指引軍事武力的運用原則及其與國家安全目標的關係，國防戰略指導著軍事準則，務使軍事體制發揮其最大效能，就是贏得戰爭而適應國家的發展與安全。因而軍事準則是國防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④軍事準則受國防戰略影響也影響國防戰略，可作為戰略決策的知識基礎，分析軍事準則是對國防戰略之性質提供深入觀察的切入點，可理解國防戰略對國際關係的性質、外在威脅的特質、國家安全需求等的基本假定，另外也可理解國防戰略最可能引發戰爭的方法、使用的部隊武力及嚇阻防止之道。

軍事準則的研究也是始於美國學者對於蘇聯國防軍事之研究，希望從軍事準則方面理解：一、蘇聯所宣布的政策及軍事著作中的立論，與其實際決策間的一貫性；二、蘇聯的戰略與戰爭的政治目標；三、戰略準則、目標與計畫。因為以美國的軍事準則方式思考蘇聯確有很大的差異。^⑤

軍事準則可解釋為說明武裝部隊作戰環境及其運用方法與細節的一套理論。^⑥對軍事力量的規劃者而言，軍事準則就像是建築師的藍圖，依軍事準則而規劃軍事力量運用的功能與建構其結構。^⑦軍事準則影響到國際政治與國家安全，^⑧不可輕忽。例如蘇聯的軍事準則就影響西方國家的戰略，反之亦然；^⑨蘇聯前國家主席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後宣告蘇聯的軍事準則是完全防衛性的，就改變了整個國際政治，^⑩當然俄羅斯也就正處在尋求新準則的狀況下。^⑪

軍事準則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維持國家的生存，也就是軍事準則的軍事手段要與國防戰略的政治目的相結合，這也就是軍事準則要使軍事體制發揮最大效能。這涉及到軍事準則必須對軍事體制的組成與運用提供遵行原則，特別是要結合國防戰略，因此，軍事準則要有創造性而不能僵化，必須因應政治情勢的變化，一旦政治人物對國家安全的目標改變了，軍事體制也就必須改變他們的組成與運用計劃，尤其在國家外交政策上。譬如政治人物對敵人或盟國的界定改變了，軍事體制就必須因應此政治情勢

註④ 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3.

註⑤ 范·克里夫 (William R. Van Cleave) 著，「演變中的美國對蘇俄軍事準則與戰略之看法」，秘鯤鵬等譯，蘇俄軍力展望 (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頁五三～九七。

註⑥ 王漢興譯，「緒論」，王漢興等譯，各國軍事準則專輯 (台北：黎明文化，無出版年月)，頁一。

註⑦ Harry G. Summers, Jr., "Military Doctrine: Blueprint for Force Planning," *Strategic Review*, Vol. 20, No. 2 (Spring 1992), pp. 9~22.

註⑧ Barry R. Posen, *op. cit.*, pp. 15~16.

註⑨ Gregory Flynn, ed.,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and West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註⑩ 學者史考特等 (Harriet Fast Scott & William F. Scott) 在一九八八年認為戈巴契夫的宣告只是宣傳罷了，並沒有改變其攻擊的軍事準則，但後來蘇聯從東歐撤軍及解體，證實其軍事準則是改變了。Harriet Fast Scott & William F. Scott,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Continuity, Formu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88), pp. 253~265.

註⑪ Shannon M. L. Hurley, "Looking for a New Doctrine Model," *Military Review*, Vol. 74, No. 6 (June 1994), pp. 22~28.

變化而改變他們的計畫，當然也包括對敵人軍事力量、軍事科技及本身社會變化的因應。就本文而言，則較關切軍事體制對政治情勢變化的因應。在「文人至上」(civilian supremacy)的原則下，軍事體制必須接受來自文人政治人物的國防戰略與軍事準則。簡言之，軍事體制是工具性的價值而不能取代政治體制的實質性價值，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軍事體制只是被動的接受而不能有所回應。

軍事準則就其本質可分為攻擊型、防禦型與嚇阻型，^⑩不同的軍事準則也就有著不同的原則。攻擊型的軍事準則會增加軍備競賽與戰爭的可能性與強度；防禦型或嚇阻型則會軍費減少，防禦或投降的成本較攻擊便宜，並為便於動員而要求較長的戰爭期間。^⑪當然軍事準則也可以在其政治企圖上是防衛的，但其軍事準則可採取先制的攻擊，防禦可進一步區分為防禦性防禦(defensive defense)和預防性防禦(preventive defense)，前者是指一個國家等待威脅實際降臨之後再去對付；後者則是指在防止潛在而非實際的威脅。或也可區分為消極防禦(passive defense)和積極防禦(active defense)，前者是單純防守、阻擋敵人進攻的防禦；後者是在戰略防禦階段或是在敵軍準備攻擊時，採取積極的攻勢行動，並在敵軍力量削弱時轉為反攻與進攻。據克勞塞維茲的觀點是：「純粹防禦與戰爭的理念完全違背，因為那將無異於只有一邊在進行戰爭。」；^⑫「防禦是一種比攻擊較強的戰爭形式。」；^⑬「應該把轉入反攻看作是防禦發展的必然趨勢，是防禦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不論什麼場合，如果通過防禦形式所獲得的勝利在軍事上不以某種方式加以利用，而聽任它像花朵一樣枯萎凋謝了，那就是重大的錯誤。迅速而猛烈轉入進攻（這就是閃閃發光的復仇利劍）是防禦的最光彩的部分」。^⑭

就戰略文化的思考，軍事準則本質的選定，國家的軍事歷史或經驗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其他因素亦不可忽略。國家的軍事歷史或經驗導引出該國的戰略文化與戰略原則，進而發展出其軍事原則，林中斌從中國的傳統軍事史上，重新思考西方人對中國戰略文化的理解而有新的認識。^⑮戰爭的經驗使國家對威脅的體認與認定，有著先驗的假定，甚至會產生偏狹的戰略意志，以軍備競賽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必要時以預防性防禦作為其侵略攻擊的藉口。甚至其他國家的戰爭經驗也會是選定軍事準則的參考因素。廿世紀重要戰役就改變了歷史發展方向與戰爭的決定性因素，^⑯波灣戰爭被視為現代戰爭的新型態，它向世界展現了高科技現代化戰爭的場面，也向人們預示了未來戰爭模式、特點和規律；^⑰舊有的戰略戰術準則已不適合戰爭的需要，必須加

註⑩ Barry R. Posen, *op. cit.*, pp. 14~15.

註⑪ *Ibid.*, pp. 16~24.

註⑫ 鈕先鍾譯，克勞塞維茲戰爭論全集(中)(台北：軍事譯粹社，民六十九年三月)，頁五五七。

註⑬ 同前註，頁五五七~五七一。

註⑭ 同前註，頁五七七。

註⑮ Lin Chong-Pin, *op. cit.*, pp. 17~36.

註⑯ 楊連仲譯，廿世紀重要戰役(上下冊)(台北：三軍大學譯印，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六十八年二月)。

註⑰ 張相元、王勇、胡東華主編，「前言」，海灣戰爭縱覽(北京：海軍海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一。

以修訂以因應未來的挑戰。^⑤另外，文武關係與官僚組織亦對軍事準則的選定產生影響，軍事準則若由軍事體制自行選定則趨向攻擊型。波森（Barry R. Posen）就以組織理論說明軍事組織偏好於攻擊性的軍事準則之原因，因為這有助軍事組織降低不確定性、增加其專業性與權威、增加組織規模與財富、強化其自主性。^⑥但基爾（Elizabeth Kier）則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因為這種以軍事組織功能的命定推論是不正確的，必須從文武關係的軍事組織文化觀之，也就是軍事組織如何回應文人決策者所加諸在軍事體制的限制，不同國家的軍事文化而選定不同的軍事準則，^⑦即是文武關係間的文化因素決定軍事準則的選定，甚至，文武關係間的制度因素也是選定軍事準則的來源。^⑧

然而，軍事準則的選定也有其現實的限制，特別是弱小國試圖發展其本身的軍事準則，只有較少的選擇及較少的自由制訂自己的準則；強大國則可先行設計其理想的軍事準則，然後建造與獲得最適合於其準則使用的武器，弱小國必須先尋求可用之武器後，才能擬訂準則。就戰略文化思考，這又是源於其武器與軍事科技的發展，乃至國際關係之因素，弱小國在體認強大國準則之後，必須靈活的修正及發展出自己的軍事準則，而且要經常經由不斷的反饋過程，修正及革新以適應新的情勢。相較於此，弱小國則可有較簡單的軍事準則，如美俄兩國的軍事準則就較我國來得複雜，波森也以權力平衡理論說明軍事準則選定的多樣性。^⑨史奈德更將攻擊擴張視之為「帝國謎思」（myths of empire），意指即使證據顯示，以攻擊擴張保障安全的戰略，事實上是在損害及降低安全，但強權帝國仍藉由攻擊擴張來保障安全，^⑩這也說明軍事準則選定實非易事。

軍事準則的選定因戰略文化類型的不同而有差別。現實政治型的戰略文化，把軍事力量的運用視為處置威脅的主導手段，其軍事準則也是積極攻勢的心態與戰略。務實政治型戰略文化回應威脅的方式，完全視本國的能力與利益而定，調和的與外交的手段都可以運用，其軍事準則並無明確的攻守勢的戰略。理想政治型戰略文化下的戰略社群成員，視戰爭為一時異常的現象，人類利益的調和勝過利益的衝突，外交談判與協商都可取代軍事力量，因此其也無所謂的軍事準則。

當然，戰略文化有所變遷後，軍事準則也就會因而發生變遷，但軍事準則的變遷卻不一定會帶來戰略文化的改變，因為軍事準則是公開特定的武力運用的規則或原則

註⑤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卷首語」，*波斯灣戰爭譯文彙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國八十二年五月）。

註⑥ Barry R. Posen, *op. cit.*, pp. 47~50.

註⑦ Elizabeth Kier, "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65~93.

註⑧ Deborah D. Avant, "The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Hegemons in Peripheral Wa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4 (Dec. 1993), pp. 409~430.

註⑨ Barry R. Posen., *op. cit.*, pp. 74~79.

註⑩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0.

，一旦武力的組成與運用產生變化，就會促成軍事準則的變遷；然而戰略文化卻是隱含普遍的習慣行為模式與價值符號體系，其變遷是漸進性的演化過程，軍事準則的改變必須歷經長期的適應而成爲戰略社群成員普遍的習慣行為模式後，才能改變戰略文化。對於他國的戰略文化之研究，在各國定期發表的國防白皮書、國防首長在立法機關的國防報告、總統的國情咨文，乃至國家安全體系所作的背景資料等，都是觀察國家戰略文化持續與變遷的資料，同時也必須考量是否有利用這些聲明來否認或隱瞞其弱點之可能？前蘇聯就是有藉此欺騙國際與美國的例證。^⑥

柒、結語：戰略文化研究之省思

戰略文化研究提供了戰略研究的新角度，誠如葛瑞（Colin S. Gray）所言，戰略文化研究有著較爲改善的文化理解、辨別（戰略）政策動機與預測可能行動的能力、相互溝通的能力及評斷對方事件意義的能力，^⑦或可如孫子所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來說明戰略文化研究的企圖，但由於戰略文化研究引自（文化）人類學，其意涵模糊且分歧，加諸社會整體價值（文化）與戰略文化影響間的分別，乃至重要的（文化）人類學概念如社會化、內化、涵化與同化，在引用於戰略文化的研究上，易產生分歧與爭議。因爲文化是歷史、觀念、價值、選擇、象徵，既是行爲的抽象，又是行爲的結果，它基本上是人類的生活方式，藉由互動的生活方式而產生共享的價值、意義與規範。社會文化是社會成員的生活方式；戰略文化是戰略社群成員的思考和行爲方式，社會文化影響著戰略文化。戰略文化是個可觀察與體認的組織現象，但極易使研究者將戰略決策行爲歸因於文化因素，因爲這是最簡單的歸因，也是最難檢驗的歸因。即使在戰略文化的內容及層次上，研究者過於重視文化的外顯表象，且是短期或當下的戰略文化，忽略文化的長期變遷而易造成「命定」的結果，最後使戰略社群成員陷於「保守」與「順從」的心態。然而，戰略文化效力的衡量卻是困難，尚無定論。

若是過於強調戰略文化對於戰略決策行爲的影響而忽視決策者個人的動機、需要、欲望，乃至其在戰略社群與軍事體制的職位與角色，則會造成「見林不見樹」的結果。況且，戰略文化的外在展現常是其成員個人或團體心理因素的象徵或累積，戰略文化乃是理解戰略決策行爲的研究途徑之一，其既是戰略決策行爲的因，亦是戰略決策行爲的果，因果關係的認定必須有更「科學」的檢驗。至於軍事準則的研究，藍貝斯（Benjamin S. Lambeth）就認爲研究蘇聯軍事準則有助於理解蘇聯計畫人員所認爲的在戰略方面最理想和最佳的措施，但此仍有其限度，超過了限度不但無益，還會受其誤導。^⑧特別是利用準則界說國家政策的作法是一種美國習慣，他國很少應用，

註④ 王漢興譯，「蘇俄軍事準則的根源」，收於王漢興等譯，前揭書，頁七四～七八。

註⑤ Colin S. Gray, "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6, No. 2 (Fall 1981), pp. 22~23.

註⑥ 王漢興譯，「蘇俄軍事準則的根源」，收於王漢興等譯，前揭書，頁八〇～八二。

因為在大多數國家對使用軍隊的宣言，通常不是用「準則」來討論。^⑦同樣的，對於他國（特別是敵國）的戰略文化理解有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也是非常危險的，^⑧所以對於戰略文化與軍事準則的研究，有待學者與實務者進一步發掘與努力。

*

*

*

註^⑦ 潘慶宗譯，「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的軍事準則」，收於王漢興等譯，前揭書，頁一七四。

註^⑧ Colin S. Gray, "Comparative Strategic Culture," *Parameters*, Vol. 14, No. 4 (Winter 1984), pp. 26~33.

